

# 准确把握民族性与世界性 是民族文学多出精品的关键

——访蒙古族评论家包明德

□本报记者 王山 曾祥书



包明德

我国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必然相侔于中国的文学态势;同时又体现着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共性特点和追求。当今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少数民族作家,对文学世界的敏感使得他们在创作中一方面借助于新的文学理念与方法,写出了大批有深度的民族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民族文学的代表,承受着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族群文化压力。尽管他们的文学作品镌刻在中国的文学版图上,并昭示着走向世界的可能,但在如何更进一步理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问题上存在各自不同的见解与认识。文学创作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外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中它占有多少比重?作家评论家应如何正确领悟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论说?带着这些问题,日前本报记者走访了蒙古族评论家包明德。

记者:文学艺术审美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个内涵极其丰富而又科学的命题。浅表理解会流俗,高深莫测会走向玄奇,偏执狭隘会自我隔绝,僵化停滞会走向枯竭。您认为少数民族作家有没有必要在创作中准确把握这两者的关系?

包明德: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在讲课中和一些文章中也曾涉及过,我要强调的是,《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人所熟知的话,即“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如果对这段话作浅表解读或误读,那么本是意义积极、导向性很强的道理,反而会造成认识与实践上的障碍。“世界的文学”是有特定而准确的含义,不可理解为当时或当今产生或存在一种超民族、超时空的“世界文学”。

“中世纪的欧洲是属于世界主义的,它被基督教和拉丁文化统一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共同的人文主义则把欧洲的作家们结合起来”。但是不久,浪漫肯定的热潮席卷而来,民族独创性又被肯定了,又被突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有的国家利用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势,向全世界推行西方价值观,以各种方式进行文化渗透和体制输出。直到20世纪末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解体,有的国外学者便妄言“历史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期间伴随着经济上的全球化,加之交通传媒的便捷,文化全球化的声浪伴随而至。国内便有学者认为国外某些文艺理论资源,就是现成的可以拿来作为中国文论的主要资源,就是我们未来学科和教材建设的基础。曾几何时,美国“9·11”事件,中东西亚的炮声与苦难,特别是近两年的经济危机,使得整个世界弥漫起对西方制度和价值的失望怀疑情绪,涌动起对新的社会形态的追索和期待的热

浪。随之,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产生了强烈的抵制,冷静和理性得到恢复,民族文化自信心和创造力得到新的增强。

恩格斯在《致保尔·恩斯特》的信中说:“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精神,并且独立的行动,尽管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他还提示人们把这些问题“彻底了解清楚”。恩格斯还指明当时的德国出不来易卜生这样的作家,当然在德国作品中也不会出现娜拉这样的人物形象。只有在当时挪威那样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文化环境中,才可能有娜拉这样具备独立品格,不能容忍当男人玩偶,追求独立自由和尊严的女性形象。作为和《共产党宣言》那段话的呼应,恩格斯在这里着重强调了民族性的重要,阐明了民族性与历史文化传统、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密切联系。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文学的首创性和民族性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传承性,从当前直到永远,丝毫不能忽视文学的民族性、本土性。那么民族文学品格与世界文学中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包明德:我们说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问题是百年课题,就应当关注历史上一些哲学家、思想家、文论家和作家在这方面经验和论述。别林斯基有段话说得很精辟,也很深邃。他说:“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一个没有了另外一个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总之,民族性是审美想象和艺术创新的介质和依恃,世界性则是民族文学的动力和追寻。

这里要强调的是,文学的根脉在本土,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在学习,在吸纳新的养料。我们处于开放的世界,时时都呼吸引到信息和语义的新鲜空气。这正是感知自己短缺,弘扬自己优长,激发创造力,用他山之石打磨自身,发展民族文学

的大好时机,是站在人类和时代精神文明的高度,激活自己,增长自己,发展自己的有利环境。看一个民族的文学是否靓丽,影响是否广泛,往往是在世界文学先进的背景下观赏显现的。雨果在世界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其他法国作家,这是因为相对说来,雨果的眼界开阔,少有民族保守性,他作品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美好的人情,更容易冲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在世界上产生广泛久远的影响。

就当前来说,在文学的民族性问题上有些模糊的误区和认知的悖论需要加以调适和疏浚。民族性不是凝固的抽象物,不是静态的符号,而是个动态的流程,是航行而不是停泊。那些被掩埋、被定格、被风干的特点和价值,不应该被停滞,而应该实现科学的转换,把古代文明中潜隐的活力和美的元素,用现代文明的杠杆加以激活和张扬。民族性不是孤芳自赏的藩篱,而是继续前行的起跑点。中外文学创作的成功经验就是能处理好民族性与人类性、现代性的关系。马克思就一再表明,他的创作一方面是得益于加勒比地区的地理与文化背景、土族民间文学和悠远的非洲血统,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欧美现代主义。我國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他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如《一个猎人的恩怨》《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和《雪》等,都扎根于鄂温克狩猎文化,却不赞美远古的荒凉,不欣赏初始的野蛮,不渲染病态的陈迹。他充分尊重和理解先辈的业绩和传统,却从不沉迷怀旧,总能用当今的眼光去鉴别和开掘那些美的元素和价值的潜流。阿来在谈到《尘埃落定》的创作经验时也说,这部小说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他在地方史和宗教史方面积累的知识,但他通过汉语阅读在各国文学中汲取的丰富营养,再有就是把他的故乡放在世界文化这个大格局,放在整个人类历史规律中进行的考量与思想。海明威作品的内容,也是他所熟悉和喜爱的钓鱼、狩猎、斗牛、打拳和滑雪等等,但在《老人与海》中溢满的是不可战胜的人类精神,让世人眼睛为之一亮。总之,强调“民族性”和“本土性”,不要被误解为是抵御“全球化”的策略,也不仅仅是表明自己的存在,亮明自己的身份。他的积极意义在于必须承认文学的差异性,并能以积极的姿态,因应多元多样文化碰撞交流的现实,主动构建我们自己的现代性,让审美想象在学习借鉴中升华,推动民族文学的创新和发展。

记者:伟大的作家与不朽的文学作品,可以诞生在任何一个民族。因而,我

们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基本研讨,可以大致归纳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整个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还有待于在世界文学发展的立体环境中寻找自己的独立价值;在把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时,必须确立一种宏观判断意识,并在这种宏观意识的引导下,选择一条既有文学的共性追求又有少数民族文学个性突破的方向。您认为应该怎样以经典文本为榜样,高扬文学的主体性和自觉性,从而达到彰显文学自由本性的目的?

包明德:中外文学的经典文本,是各个民族优秀文化提炼的结晶,是民族文化传承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源泉。经典文本的特质,是从作品的结构、精神品位、情感质量、思想价值和语言等诸方面显现的。文学经典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滋养着人们的灵魂,引导人类走向文明,心灵走向高尚。同时也引领一代又一代作家追求遥远的文学目标。

经典的艺术生命力是流经年代的。今天的读者和作家都有重读的必要。正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说,每一次重读经典,都是一次发现的航行;经典从来不会说,它该说的已经说完了。特别对于作家来说,经典作家的立世品格,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是值得永远学习借鉴的。

几十年来,我国的文学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特别是作品的数量大大地增加。同时,也多有诟病,间或还有失望的论调。这是值得静心反思的。

人们虽然不能期望作家都向司马迁、曹雪芹和巴尔扎克们学习,安于清贫苦厄,但也应倡导学习他们的文学精神,保持作家的人格和文学的坚定性,起码应该不要“被市场绑架,被欲望劫持,被时尚裹挟”。不怕吃苦受困,才能高扬文学的主体精神,才能创造出更有价值的作品。而对于漠视时代发展,排斥历史维度,空泛地抢占道德话语权的作家来说,或许能从莫里哀的“忧郁”和卢梭的“憎世”中获得某种警策,看到生活的进步和美好,从而焕发出与人为善的宽容、乐观和热情。在这样的情势下,一方面民族作家应克服或许尚存的狭隘保守、孤芳自赏的心态,加强中国作家的文化立场与身份;另一方面,国家社会和文学界要更重视对民族文学的爱护、理解、尊重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和解读。并且,应从各方面科学地考察梳理我国各民族文学交流互补的关系,以新的姿态实现中国各民族文学的互动整合,开创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局面。

## 少数民族文艺与精品意识

### 主编第一视野

盘点近两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仡佬族女作家肖勤无疑是大家公认的最引人关注的新秀之一,这位一直生活在贵州湄潭县的女子,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先后在《民族文学》《青年文学》《十月》《当代》等重要文学刊物上发表《暖》《丹砂的记忆》《金宝》《好花红》《上善》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随笔,并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刊物选载。其作品浓烈的生活气息以及独到的见解让人耳目一新,也让文学界对这位突然冒出来的女作家感到格外的惊喜。

初识肖勤,是在去年的春夏之交,《民族文学》在京西一家饭店举办“全国55个少数民族作家改稿班”,一堆人里,时而会响起一阵清脆的笑声,伴随着语速很快的贵州普通话,互相介绍时,大家才知道笑声的来源是这位圆圆脸的女乡长肖勤。肖勤不说话时不像乡长,她打扮时尚,披肩发,脚蹬皮靴,说起话来便有了乡长味,首先她一点不含糊自己就是来自基层的乡干部,而且不管场合,只要说起乡村事务,便会一脸严肃、分寸不让地说:“其实,好些人对乡镇不了解,有些看法全是乱说,有些作品全是编出来的。”

或许是由于对那些“乱写乱说”不以为然,肖勤自己拿起了笔,她带着她的小说走进《民族文学》的改稿班,在我看来,她带来的那些稿子还是懵懂懵懂的,那是她的一片天真、合着山野乡村的风韵,还有在沼泽里跋涉的混浊,小说技法基本没有讲究。接下来,她睁大眼睛,双目炯炯地坐在改稿班的课堂上,捕捉着每一位讲述者的信息,一天天的吐故纳新,她的话语也一天天的有所变化,只是笑声清脆依然。她的爽朗和伶俐似乎是伴随她的职业,但细看却更多来自于天性,她明快坦荡,让人从容地在她种植的园地里穿行,比较方便地帮她除草、灭虫、施肥,就如那些建立QQ农场的好友们,经常也互相有所帮助。肖勤接纳着人们的批评,聪明地汲取着营养,从这时,她的脚步真正开始迈出了乡村。

这不久之后的秋天,肖勤进了鲁院。那期研讨班的学员全都来自少数民族,那真是五彩缤纷啊,在这个文化趋同的年代,这些背负着不同地域和民族烙印的书写者聚集在一起,可谓意义深长。而肖勤更是有着一番丰厚独特的经历,她如鱼得水地遨游于“鲁12”——这是后来她和她的学友们对这班的爱称。我有幸受到鲁院的邀请,有机会走动于其间,得知肖勤果然勤奋得厉害,她喷发式地写作很快受到人们的关注,在“鲁12”即将结束的一天,鲁院的副校长施战军面带微笑,颇为得意地告诉我:肖勤这家伙有悟性,写出来了。后来施战军还针对肖勤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很有趣:“小说,她来了”。

肖勤果然走进了小说,再读她的作品,仿佛换了一个人,还是从前那些故事,但如同从昨夜走到了今日,夜里的懵懂混沌消失了,那些或远或近的风景,以及活动在风景中的人物在阳光的刻画下历历在目,甚至我们能感觉到那人物的体温和痛楚。肖勤不需再嘲讽着嘴说:你们不了解乡村。因为从她的笔下,人们开始读懂乡村的人,包括孩子。在乡村的留守儿童那里,缺失的不仅是热腾腾的食物,抑或书本和铅笔盒,更为缺失的是妈妈温暖的抚摸,那只手才能带来的温暖。肖勤的发现和开掘让许多读者动容,那不仅是文学的发现,也是肖勤作为一位负有责任的乡长、一位深怀母爱的女人的发现。

这样的发现在肖勤那里举目皆是,这是我又一次与她相逢时感觉到的。《民族文学》于今春在内蒙呼市美丽的可汗宫再度举办改稿班,肖勤和她的笑声又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她忙碌得很,每天要拿出个小时跟乡里的事服务对话,一边听着周围的人谈文学,一边举着手机跟贵州那边说:“这条路修的质量不好的话,我是不会付钱的。马上雨季就要来了,工程时间一天也不能拖”……转过脸来,又接着谈她的构思。她是一个擅长叙述的人,说到委婉动人处,让我们一个年轻的女编辑红了眼圈,继而离席而去,因为忍不住夺眶的眼泪。

在可汗宫,她几乎天天熬夜,曾连续三天没睡过一个完整觉,走路都在打飘,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赶修了两个中篇,新写了一个中篇还有几篇散文。其《金宝》后来刊发在今年《民族文学》第8期,我一直认为这部小说还应该引起人们更多的阅读:小镇上的金宝本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但却因为社会的挤压推搡,成为一个不停歇的上访户,与他构成关系的社会和周围的人群,到底是因为哪里出了毛病?肖勤用她的发现将人们关注的信访现象引入新的思考层面。

她的家乡对她的写作给予了极大的关切,前些时专门为她举办了作品研讨会。她邀约我作书面发言,我对她一直有些话想说,呼市的改稿班结束后,我写过一些散漫的博客,其中谈到肖勤,她的成功显然离不开长年在乡镇工作的经历,离不开对文学的热爱,离不开勤奋好学,离不开她的精神世界一次次飞跃和提升。借用一句不得不提的套话:肖勤是一位具有良好责任感的乡长——作家,她转换不同的角色,用不同的方式贴近生活发现生活,表达着对家乡土地和生活的一片真情。她的成功给更多的文学人以启示,我们离生活究竟是近还是远?

### 肖勤的发现

□叶梅

## 揭示藏族文化底蕴 描绘藏民信念追求

——记藏族作家尕藏才旦



尕藏才旦

情、博大的宗教仪轨、丰厚独特的民俗,让你走进一个陌生新鲜又情趣横生的异域文化世界。有记者问尕藏才旦为什么要把吉祥右旋寺作为地理背景时,他说,吉祥右旋寺是汉、藏、回等诸多民族杂居、文化的多样化以及雪山环绕的东部西藏,规模壮观,佛僧众多的吉祥右旋寺有广袤的教区,有众多的供奉部落、有几十万教民,有研习佛学的六大学院,有佛位不等的几十位活佛,更有如云的高僧涌现,是小说创作最为理想的背景。而处于寺主一人之下,众佛僧之上的吉塘仓活佛理应五根清净,在冥冥之中走进西天极乐世界,但事实却不尽然。他不得不在世俗中艰难生存,努力拓展。他曾为反抗地方军阀的欺凌掠夺,极尽心计,巧于周旋,暗地支持寺主,佛父、佛兄起兵反抗;在认定寺主灵童过程中,他不得不与坚贝央家族互施心术、斗智巧取;为争夺政教大权,他不得不联络各方,维护和强化寺院政教合一的特权而熬煎心血,与佛父、佛兄不断较量;为壮大自己的实力和威望,他又组织商队,远走蒙古地区,四方奔波,积累财富;他在感情的海洋中,在爱的波澜中起伏徘徊;他挥动佛手,铲除鸦片,化除仇恨,广结善缘……

有评论家认为,《首府金座活佛》揭示了一个

佛生命中的光明与阴霾、幸福与悲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至尊至贵活佛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形象,看到了人类群体中一个鲜明而神秘、独特又平凡,即是神佛,又是凡夫俗子的独特类型。他们两重心境、两种性格,矛盾对立,又统一一体,是特殊人物、特殊生活、特殊人际纠葛,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

与众多作家习惯抒写自己熟悉的领域一样,尕藏才旦的创作始终没有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那块土地,他深深地爱着这块故乡的热土,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民族。

在他眼中,藏族的岩画、石雕、玉雕、木雕、泥塑、铜塑、鎏金铜塑;唐卡、堆绣、壁画、酥油花;锅庄舞、工布舞、马铃舞、谐青、牦牛舞、狮子舞、鹿舞、囊玛、热巴舞、法舞等等都是一代又一代藏族人民的智慧结晶。

在他笔下,巴塘谐、拉萨谐、声乐种种,器乐纷繁佛教妙音;藏戏、杂技、书法……布达拉宫,古格王城、官寨、碉楼、民宅、帐房等都是世界少有的珍品。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凡是世界所拥有的艺术种类藏族都有,藏族已成为世界艺术的缩影,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惊叹不已,简直是绵亘千年的

博物馆!一样样、一桩桩,化为生命燃烧的火焰,驱散了高原几许风暴雪花,化解了“生命禁区”几多悲哀肃杀,振奋了雪域儿女满腔热血。

在他心里,这些艺术是对现实的慰藉,对未来的憧憬,也是理想的长明灯。它折射的是藏民族的底蕴,透溢的是藏民族的信念和追求。他坚信,藏族是一个富有创造才华的民族,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真善美、热爱艺术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会永远屹立在地平线上。

在尕藏才旦看来,先辈给我们留下了如此灿烂丰厚的文化遗产,作为子孙后代,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继承先辈的优秀文化遗产,让其发扬光大,永远放射光和热,照耀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可这不是一两个人肩负的使命,而是整个雪域儿女共同的责任,可喜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初具规模的艺术队伍,与其说《吉祥右旋寺》是我创作的,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民族集体智慧集成。我只是一个记录者,它是我们民族共同的奉献,共同的心血,我谨用笔来揭示藏族文化底蕴,用笔来讴歌藏族人民信念追求,用真诚的心向我们这个民族致以诚挚的礼赞!

对于自己的创作,尕藏才旦也有自己的感受,那就是直面人生,直面生活,真实地反映藏区现当代历史变革、社会变革、思想观念变革,探求时代变革的真谛,在浏览、阅读作品中“厚积”,在给读者健康的审美感受和思想启迪中“薄发”,力求自己今后的作品能在历史性、人文关怀和审美升华三者辩证关系中有所表现。这既是他的创作的追求,也是他创作的宗旨所在。

(曾祥书)